

| R E N W E N J I C H U |

人文基础



向怀林◎主 编

所谓人文，简而言之，就是由人的生存意愿、价值追求所决定，在人的长期生存实践中形成的符合人的自在需求的人类文化现象，它是人所创造的、与自然现象相对应的人类社会现象。古人“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诚此之谓也。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人文基础

RENWEN JICHU

向怀林 主编



江西省图书馆



11265743

重庆大学出版社

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基础/向怀林主编.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624-5691-9

I. ①人… II. ①向… III. ①人文科学—教材 IV. ①C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7330号

人文基础

向怀林 主编

策划编辑: 唐启秀

责任编辑: 杨敬 王便利 版式设计: 唐启秀

责任校对: 夏宇 责任印制: 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 400030

电话: (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 (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川渝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2.75 字数: 610千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7-5624-5691-9 定价: 39.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主 编：向怀林

参 编：阳 雯 庞国栋 李 蕾

洪 瑶 陈 萍 朱 姗

龚 莎 向曙曦 张唯佳



编写说明

所谓人文，简而言之，就是由人的生存意愿、价值追求所决定，在人的长期生存实践中形成的符合人的自在需求的人类文化现象，它是人所创造的、与自然现象相对应的人类社会现象。古人“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程颐《伊川易传》），诚此之谓也。

人类的文明史，也就是人文的历史。人由动物进化到人，精神洞开使其具有了两大需求：生存需求与自在需求。于是，人类的进步就有了两大路径：认识自然、利用自然，让自己的行为顺应自然而免受其害，进而让自然造福于己，由是产生了科学；认识自己、张扬自己，把自己的精神欲求外化为诗意的生存方式，由是产生了人文。由是观之，科学授人效用，人文予人美善；科学让人聪明，人文使人高贵。古往今来，人类在这两大路径中不断前行，写下了辉煌无限。

然而，近代工业文明的崛起，却使人类行进的两大路径变得迷离。工业文明是人类在科学进径中取得的辉煌，其本质特点是人类将所掌握的自然知识作用于生存实践，由此获得高效功用与丰厚财富。无庸讳言，当今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和文明成就，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享受着物质带来的巨大快乐，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效用推崇备至。今天，对效用的追求已成为雄峙巅峰的社会价值原则，温情敦厚的人文传统被挤压与扭曲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一旦效用取代美善，人类社会与混沌未开之际又有何异别？人文不再，人类又何堪其自在之殇？况且，科学与人文，本来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双翼，如若痛失一羽，人类的良性发展又从何谈起。这是我们在对科学成就顶礼膜拜时，不能不思考的沉重话题。其实，西方一些智者对此早有警惕。19世纪末，齐美尔（Georg Simmel）、涂尔干（Emile Durkheim）、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等人都曾敏锐地洞察到西方人文传统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失衡带来的社会危机，并就此开出过补救的处方。到了20世纪50年代，传统与现代二元互补的呼声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思潮。而在今天的中国，作为后现代社会主流特征的经济至上、物唯其用的潮流也正在倾覆国人礼义传家、温柔敦厚的人文传统，由此病垢的种种痼疾我们已屡见不鲜。长此以

往，中国将何堪其重。痛于斯，我们编撰此书，旨在为重塑人文传统洞开一隅，为青年学人抛砖引玉、为重续诗意精神负薪抱火，希冀时人在趋骛效用之余，尚能重拾人文高贵。诚若是，幸甚。

为了便于学习者在较短时间内对人文传统有一个具体而系统的认识，本书将人文要义整合为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传统与习俗五个内容板块进行介绍、描述。每个内容板块分通论、文选（或作品鉴赏）、学习实践三个部分。在通论部分，我们采用学科描述、学科简介的方式，力求将内容板块作一个概览式的整体陈述，使学习者对相关内容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基本把握。在文选（或作品鉴赏）部分，我们以学科性、代表性、新颖性为原则，力求遴选出相关的文献（或作品）精华，有助于学习者对相关内容的深化学习。在学习实践部分，我们将一些重要知识以思考题的方式对学习者的进行引导启迪，以期调动学习者的兴趣，形成学习上的互动。在这一部分，我们还附加了学习网站，为学习者对相关问题的自主性学习和拓展性学习提供方便。本书尚有配套学习资源在建设之中。

本书编写分工如下：向怀林负责本书的整体构思、策划，统筹及统稿工作，对全书进行修改、补充、增删、编校，负责哲学内容板块的编写；庞国栋负责历史内容板块的编写，编写历史概说、中国古代历史概述，编选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并作注；朱姗编写西方历史概述，编选西方历史文献；阳雯负责文学内容板块的编写，编写文学概说、西方文学概述，编选西方文学作品；向曙曦编写中国文学概述，编选中国文学作品并作注；李蕾负责艺术内容板块的编写，编写艺术概说、中国艺术概述、西方艺术概述，编选中外艺术作品并作鉴赏分析；龚莎编写影视部分内容，编选影视作品并作鉴赏分析；张唯佳编选音乐作品并作鉴赏分析；洪瑶负责传统与习俗内容板块的编写，陈萍辅佐洪瑶的工作。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李国渝、江涛、卢跃生、冉红、钟倩、彭丽、吴坤甫、谭蓓、黄翔等领导的鼎力支持，尤其倍受李国渝先生的悉心呵护，并得到重庆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唐启秀、王便利、杨敬等编辑提供的诸多方便，也受到众多热心人士的真情关怀，在此深表厚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和资料，这里就不一一列举，谨向这些书籍和资料的作者表示由衷感谢！

人文传统源远流长，灿若星汉，本书所撷掇的，恐怕不及沧海之一粟。加上本书编写团队学识有限，难免秉燭火于日月。故本书粗疏破敝之处比比皆是，诚请读者批评指正。

向怀林

2010年7月

哲 学

哲学通论

- 003 哲学概说
- 004 中国古代哲学概述
- 012 西方哲学概述

文 选

- 026 《周易·系辞》
- 029 李耳：《老子》
- 034 孔丘：《论语》
- 037 孟轲：《孟子》
- 039 庄周：《庄子》

- 041 朱熹：《仁说》
- 042 柏拉图：《理想国》
- 047 笛卡尔：《谈谈方法》
- 050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 052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 061 加缪：《西绪福斯神话》

064 学习实践

历 史

历史通论

- 071 历史概说
- 072 中国古代历史概述
- 087 西方历史概述

文 选

- 099 《尚书》
- 101 《左传》
- 103 司马迁：《史记》
- 106 陈寿：《三国志》
- 109 司马光：《资治通鉴》

- 114 《圣经》
- 11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 119 达特：《十字军东征——以耶路撒冷之名》
- 120 托马斯·杰弗逊：《独立宣言》
- 122 穆尼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 124 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

127 学习实践

文学

文学通论

- 133 文学概说
- 135 中国文学概述
- 142 西方文学概述

文选

- 152 神话五则
- 154 《诗经》
- 155 《左传》
- 157 刘义庆：《世说新语》
- 158 唐诗五首
- 160 宋词四首
- 161 王实甫：《西厢记》
- 163 冯梦龙：《卖油郎独占花魁》
- 169 曹雪芹：《红楼梦》
- 171 胡适：《我的母亲》
- 174 周作人：《乌篷船》

- 175 新诗三首
- 179 徐訏：《夜》
- 181 沈从文：《边城》
- 183 钱钟书：《围城》
- 185 张爱玲：《倾城之恋》
- 188 荷马：《伊利昂纪》
- 193 塞万提斯：《堂吉珂德》
- 196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
- 198 华兹华斯：《水仙》
- 199 雨果：《九三年》
- 206 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 209 塞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
- 213 乔伊斯：《尤利西斯》

216 学习实践

艺术

艺术通论

- 227 艺术概说
- 228 中国艺术概述
- 236 西方艺术概述
- 248 影视艺术

作品鉴赏

- 254 顾恺之：《洛神赋图》
- 255 王羲之：《兰亭序》
- 256 怀素：《自叙贴》（局部）
- 257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 258 朱耷：《荷花水鸟图》
- 259 郑燮：《墨竹图》
- 259 吴昌硕：《蒲塘秋艳》

- 260 张大千：《泼墨荷花图》
- 260 齐白石：《虾》
- 261 徐悲鸿：《八骏图》
- 261 阿格桑德罗斯：《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
- 262 达·芬奇：《蒙娜丽莎》
- 263 乔凡尼·洛伦佐·贝尼尼：《阿波罗和达芙妮》
- 263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 264 克拉斯姆斯柯依：《无名女郎》
- 265 克劳德·莫奈：《日出·印象》
- 266 梵高：《向日葵》

266 毕加索:《格尔尼卡》

267 达利:《记忆的永恒》

268 谢尔盖·爱森斯坦:《战舰波将金号》

269 罗伯特·泽米吉斯:《阿甘正传》

270 汤姆·提克威:《罗拉快跑》

271 宫崎骏:《千与千寻》

272 詹姆斯·卡梅隆:《阿凡达》

274 张艺谋:《红高粱》

275 李少红:《大明宫词》

276 《春江花月夜》

277 华彦钧:《二泉映月》

277 刘半农、赵元任:《教我如何不想他》

278 何占豪、陈钢:《梁祝》

278 莫扎特:《土耳其进行曲》

279 贝多芬:《命运交响曲》

279 舒伯特:《鳟鱼五重奏》

280 约翰·施特劳斯:《蓝色多瑙河圆舞曲》

281 肖邦:《降E大调夜曲》

281 迈克尔·约瑟夫·杰克逊: *we are the world*

283 学习实践

传统与习俗

传统与习俗 通论

299 传统与习俗概说

301 中国传统与习俗概述

309 西方传统与习俗概述

文 选

313 陆羽:《茶经》

317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328 司马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329 张爱玲:《更衣记》

333 冯友兰:《东西文化之分与城乡文化之别》

336 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

341 《圣经·创世纪》

342 施瓦布:《盗取人类的火种》

345 《圣经·路加福音》

348 任学安:《五月花号与感恩节》

351 学习实践

哲学

哲学通论

哲学概说



哲学是人类认识外界与自身本质的观念形态,是人对自然、社会、思维的认识活动,是价值观、世界观的学说。其关注的根本问题是自然、社会、人的本质问题。当人类进化到把世界不仅仅作为物质把握的对象,同时也作为精神把握的对象时,哲学便产生了。换言之,当人类从自然界中迈向文明与智慧,其生存活动就不仅仅依靠自然本能,而更多的是依靠理性与智慧。于是,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暂时与永远、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等问题就成为人类生存活动的重要内容,这样,哲学问题便应运而生。因为,人类不仅是自然的存在物,而且也是精神智慧的存在物,人是通过其精神滤化来认识世界并谋求生存发展的。这样,人的世界就不仅仅是自然,同时还有自在。也就是说,超越其自然的有限性而通达其精神的无限性是构成人类生存的重要内容。如此说来,哲学就是人类精神本质的标志。

哲学作为人类重要的精神现象,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人类早期的巫觋现象、图腾崇拜、祭祀行为,其本质是人对自然的探究与解读,是人类最早的精神实践行为,应视为人类早期的哲学现象。哲学的学科概念,则源自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术语 Φιλοσοφία,后演变为 *Philosophia*。*Philosophia* 由 *philein* 和 *sophia* 两个词汇组合演化而来,*philein* 是动词,指“爱 and 追求”,*sophia* 是名词,指“智慧”。因此,*Philosophia* 的本意就是爱智慧、追求智慧、追求真理。

最早使用 *philosophia* (爱智慧) 和 *philosophos* (爱智者) 这两个词汇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据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德在《论无生物》中的记载,当毕达哥拉斯在同西库翁或弗里阿西亚的僭主勒翁交谈时,第一次使用了 *philosophia* (爱智慧) 这个词汇,并且把他自己称作 *philosophos* (爱智者)。毕达哥拉斯认为,在生活中,一些奴性的人生来是名利的猎手,而 *philosophos* (爱智者) 生来寻求真理。追求真理的人,也就是追求智慧的人。

可见,哲学的本质是人对世界真象进行求知与作出合理性解释的思维现象,是人通过现象世界,对世界本质和规律进行理性思考、探究、归纳、抽象的特殊的、精神行为。因此,哲学属于人的观念形态,而不是生产形态,也不是自然规律本身,这是哲学与科学的根本区别。哲学的着眼点是人通过对世界的宏观观察与思考,抽象出世界的一般规律与本质特点,形成的是观念与看法,属于价值形态;科学的着眼点是人对具体事物规律的探究与解析,归纳、总结出认识事物、利用事物、改造事物的方法与策略,形成的是知识与技能,属于知识体系。二者的区别在于:哲学属于意识形态,是我们看世界的方法、观点、态度;科学属于工具理性,是人类作用于生产实践的知识与技能;科学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知识、技能、方法,具有具体性和实用性;哲学是人类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基本原则与立场,具有抽象性与指导性;科学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实践,哲学是对人类价值理想与终极目标的思考和追求。因此,哲学是

影响人类行为的观念形态和价值“元立场”，是昭示人类无上智慧与无限理想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对各类学科都具有启迪意义。

哲学的日常意义体现在：①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我们能够清醒地看待世界和自我。②丰富、深化我们的知识，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成为一个既有理性又有品味的人。③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与判断能力，使我们成为思考的动物和生活的强者。

哲学对人类的意义体现在：①作为智化的动物，人类的生存活动不仅仅依靠自然本能，而更多的是依靠理性与智慧，因此，哲学是人类重要的生存方式。②哲学是人类智化和进步的标志，是人类理性的灯塔，引领人类不断朝向理想中的未来。③哲学是人类超越性的价值体系，尽管不能具体作用于生产实践，也不具有具体的实用功能，但对人类的社会行为和生存行为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引导作用，是人类生存活动的最高原则，它所涉及的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and 人类精神的终极追求，对人类的思维方式、思想深度和广度、道德境界和生存理想具有深刻的指导性和影响力。从这个意义讲，哲学影响着人类的未来方向和文明走向。

中国古代哲学概述



中国古代没有类似于西方哲学的学科概念，“哲学”两个词汇也不连用，但哲学现象却一点不逊色于西方。一般认为，周代子学阶段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成熟期和第一个繁荣期。“诸子百家”，乃至更早的《周易》里面，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哲”一词在中国起源很早，历史久远，按《尔雅》和《说文解字》的解释，“哲”的本义都是“智”，如《尚书·皋陶谟》中有“知人则哲”；《诗·小雅·鸿雁》中有“维此哲人，谓我劬劳”。这里面的“哲”，就是智慧的意思，与希腊词汇 *Philosophia* 中的 *sophia* 意思相似。因此，后来的人常常用“哲”字来指代那些富于智慧、善于思辨、学问精深的人，即西方所谓的“哲学家”“思想家”之类，如“孔门十哲”“古圣先哲”等。十九世纪末，日本学者西周用汉文将 *philosophia* 译成“哲学”，随后，黄遵宪又将“哲学”一词转介到中国，这样，“哲学”这一西方学科概念就开始在中国流行。

中国古代哲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观念哲学阶段。从民智初开的原始社会到早期哲学现象在商代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发轫阶段。哲学萌芽于原始宗教。上古时期，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了解极其有限，先民们只能按照对自身的认识了解来诠释自然现象，他们一方面对神秘莫测、不可抗拒的自然无比敬畏，一方面又将自然拟人化，把自然幻想成和自己一样具有情感意志、人格力量的对象，这样，自然在人的想象中就成为具有人格意志的神秘对象，于是，就产生了人类早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鬼神崇拜。所以，人类早期的鬼神崇拜，是理性精神与宗教情结的产物。换言之，人类早期的鬼神崇拜，是人类从无知迈向认识神秘大自然的第一步，是人类在幼年对大自然进行主观自觉性认识的必然产物，是人对自然现象的能动反映和观念化表现，体现出智慧初开的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求知与探究精神，是人类哲学思想的启蒙。因此，人类早期的鬼神崇拜与祭祀行为同今天的封建迷信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早期人类对自然世界自觉思考、认识的结果，代表了早期人类对自然世界的理性思考与探索，是人类最早的观念化实践，其本质是文明的；后者则是对自然真象的有意歪曲与虚妄解释，代表了一些反文明人群的无知与愚昧，其本质是反文明的。鬼神崇拜就必然产生祭祀行为，主持祭祀的人在西方和古埃及叫祭师，中国叫巫覡（女祭师为巫，男祭师为覡）。上古的巫覡，往往由部落里德高望重的智者担任，这些人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与经验，

对天文、历法、农业、医疗、艺术具有很高造诣,是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与思想家。

他们的出现,带来三个重要的结果,一是产生了中国古代最早的知识分子,到了商代,这些掌握了祭祀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人被叫作“儒”,再后来,就叫作“士”,与今天流行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已非常相似;二是产生了中国的文字,我们知道的迄今为止最早的古文字甲骨文,就是他们在祭祀天地、占卜吉凶的活动中创造的;三是产生了早期的哲学思想萌芽,如商代甲骨文辞中表现出的敬畏自然、把自然规律与人的生存行为自觉联系起来进行思考遵循的例子,比如“癸巳卜,壳贞:旬亡祸?王占曰:有祟,其有来艰。乞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戛告曰:土方正于我东鄙,灾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郭沫若《卜辞通纂》第五一二片);一些古歌谣、古文献中表现出的顺应天道、祈福禳灾的思想,如《礼记·郊特牲》中记载的伊耆氏蜡辞:“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的北行短歌:“魑不得复上,所居不雨,……魑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尚书·洪范》中记载的“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尚书·盘庚》中记载的“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等,表现出早期人类对神秘自然力量的敬畏与幻想。先民们以朴素、元初的方式解读自然的真象,并自觉地把对自然真象的理解作用于人的生存实践,具有强烈的自我忧患意识与反思意识,这正是人类哲学活动的本质特点。因此,上古的巫觋,是中国最早的启蒙哲学家,而上古自殷商时期,先民们求知自然、诠释自然的观念实践,则意味着中国古代观念哲学的出现。

第二个阶段:周代子学阶段。周代子学阶段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原创阶段。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学术极为活跃的时代。社会的动荡、王权的式微、各诸侯国的励精图治,使思想观念空前活跃,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希望自己的思想主张能兴利除弊,为王者所用,于是,就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所谓“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文化奇观。周代子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所谓“子学”,是指“诸子之说”。“诸子”是先秦时期对各学术流派知识分子的尊称,“子学”就是各种知识流派的学说。汉代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 these 流派大致分为十个,分别是:道、儒、墨、法、名、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子学涉及的学科十分广泛,几乎涉及现代学科的各个领域,反映的哲学思想也极为丰富。

比如,道家提出了“道”的哲学命题,认为“道”是统揽天地万物的宇宙本原,是一切存在的根源,“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天道恒长、自然而然,由此建构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理念的哲学体系。道家哲学从天道运行的原理切入,开拓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价值理念的“道”的哲学范畴,并由此创建了一种超乎现实、朝向自然本原的哲学话语。天道的运行是独立不改、自然而然的,道的哲学即在解明这一永恒不变的规律内涵,进而为人的合理存在揭示出一个超越时空、朴素自在的理想空间。因此,道家哲学对人的导向作用是自然无为、见素抱朴、守柔不争,不主张急功近利、预设欲望的现实立场,而更提倡人在纯自然状态下的豁达心性与价值定位,使之与自然而然的“道”相契合。道家开启了中国古代以自然本原为价值取向的哲学体系,它与传统的阴阳五行思想一同奠定了中国自然哲学的基础,其理论建树对其他学术思想影响极大,对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辩证法有较大贡献;道家哲学形成了中国古代艺术中自然主义的重要品格,其“道法自然”“物我为一”“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言不尽意”的思想对中国古代艺术创作的影响极为深刻,形成了中国古代朴素、自然、含蕴的艺术传统,中国古代艺术创作中追求的“超言绝象”“意在言外”“情景交融”“意境意趣”等,与道家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道家“清静无为”“守柔不争”的思想形成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藐视时俗、约束心性的心理动力,与儒家入世精神同构为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模式,对中国民众人文品格的影响极为深刻;另外,道家“道法自然”的超现实精神追求和“静观”“玄览”“含德”“抱一”的心性修养理念,成为

道教文化重要的思想来源,对中国社会心理、民俗传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代表著作是《老子》《庄子》。

儒家哲学则以强势的道德意识与贴近现实功用的世俗价值取向,创建了贯穿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体系。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体系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道德信念与价值基础。儒家哲学是以对天命(自然规律)的理解以及天人关系的各种可能性的比较选择为出发点,来创建其朝向现实社会的思想体系的。《周易》从永恒不变的宇宙变易规律着手,建立了一个纵贯而下的生命系统,不仅完成了宇宙本体论的建构,也为儒家通过道德实践来顺应天命实现天人和谐提供了理论依据。孔子推崇的“仁”“礼”,孟子提出的“仁政”“尽心”“养浩然之气”,荀子提出的“化性起伪”,《大学》提出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中庸》表述的“诚之者,人之道也”及“慎独”的思想,尽管儒家学者们对人的心性修养及道德超越的可能性的设计各不相同,但他们共同的思想取向却是一致的,即通过人类克己奉公的心性陶冶和由内而外的道德实践,去追求并实现儒家立足现实的社会理想和精神追求。儒家学说以现实精神和世俗取向为立场,具有强大的济世作用与社会功能,两千多年来,成为中国社会稳定团结、治国安邦的主流话语和社会基石,其价值意义在危机四伏的当代社会尤应深刻发掘;儒家学说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在漫长的古代社会用理性的道德教育替代了狂热的宗教信仰,避免了中国社会陷入宗教狂迷和分裂,对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民族团结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重视人的崇高气节与高尚操守的价值取向,成为国人维护正义、爱国爱民的精神传统。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代表著作是《周易》《礼记》《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墨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兼爱”,主张从大众立场上谈“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其价值取向是朴素的平民主义,由此提出“爱无差等”的理想命题,认为天与鬼是掌握正义、赏善惩恶、爱利百姓的最高主宰,其智慧与权威远远超过所有君王,主张用敬天事鬼的朴素宗教观取代一切道德与权威,实现其平民主义理想。墨家哲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崇尚实践与求实作风的科学主义精神。由于墨家哲学的平民品格,其思想功能取向追求大众实利与求实作风,由此形成严谨的理论模式与验证标准,发展出相当严格的逻辑推理,同时也开创了中国古代工程学的先河。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翟,代表著作是《墨子》。

法家哲学是一种强权哲学,其核心理念是强调统治者的权威和对国家的专制。法家所言的“法”,并非今天基于公众权利、置于社会约束、国家运行准则的“法”,而是以“法(刑法),术(政治伎俩),势(君王权势)”逐级统治为根本的“法”,名为法制、实为人治,其实质是用严刑苛法来维护君王权威、实行国家专制。周代,治理国家有两种基本方略,注重教化的“礼”和主张处罚的“刑”。儒家推崇前者,法家推崇后者。法家认为,天道与人没有实际的利益关系,用天道来影响人的行为只是一种迷信,没有实际效果,而人的本性是恶的,趋利避害、贪婪自私,不堪礼乐教化,只有严刑苛法才能禁民为非,因此强调统治者的集权与强力统治。法家是中国先秦最重要的以“法”立论的思想流派,对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等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对法理学有重要贡献,形成了较完备的封建专制理论,为后来建立中央集权的秦朝统治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中国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后代变法,亦莫不受其影响;法家夸大权力和专制的作用,否定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对中国长期以来的“专治”与“人治”有明显的推导作用。法家的代表人物是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代表著作是《韩非子》。

名家学派是周代子学中的方法论哲学流派,是以思维的形式、规律和名(概念)实(事实)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派,战国时称“刑名”或“辩者”,西汉后始称名家。名家萌芽于春秋末期,郑国大夫邓析为其先驱。名家分为“合同异”与“离坚白”两个基本流派,前者以宋国

人惠施为代表,认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万物之“同”“异”都是相对的,皆可“合”其“同”“异”而一体视之,强调事物的统一性与关联性;后者以赵国人公孙龙为代表,认为事物就像一块石头,用眼只能感觉其“白”而不觉其“坚”,用手只能感觉其“坚”而不感觉其“白”,因此“坚”和“白”是分离的、彼此孤立的,强调事物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名家在战国中期曾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学派,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逻辑学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名家的代表人物是邓析、惠施、公孙龙。梁启超在《论诸家之派别》中说:“名家言起于郑之邓析,而宋之惠施及赵之公孙龙大昌之”。名家的代表著作是《公孙龙子》。

阴阳学派是流行于战国末期到汉初的一个哲学学派,齐人邹衍是其代表。《史记》称其“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迁怪之变”。大体而言,阴阳家们的思想,是将古代的数术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发展为对宇宙运行模式进行解说的学说,用以揭示自然现象的成因及变化法则,但其实质,则是以自然法则为基质,切入对人事法则的诠释。阴阳是古人解释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事物现象的概念。古人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用直观的方式抽象出宇宙基本的存在方式是一种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现象,如天地、日月、昼夜、水火、黑白、冷暖、大小、美丑、高低、刚柔、正反、强弱、快慢、好坏、雄雌等,并将这变化的数理和哲理运用到对一切事物的验证与解释,由此形成极具前瞻性又奥妙无穷的阴阳理论。五行则是对宇宙五种不同属性物质类型的抽象概括,是讲宇宙物质的运动与变化的。所谓“行”,郑玄《洪范注》曰:“行者,顺天行气也。”古人把这五种不同属性的物质类型称呼为水、火、木、金、土,它们相互排斥又互为关系,古人解释这种生克关系的学说就叫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古代的历法、医学、预测学、健身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深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价值的瑰宝,其理论博大精深,前瞻性极强,当代科学尚不能解释其实践原理,因此,其价值意义有待深入发掘。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邹衍。阴阳学派的著作均已佚失,只能从一些相关文献了解其著作篇名和少许文献残片。

周代子学尽管在宗旨、内容、风格上各异,但却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积极有为的学术态度标志着先秦理性精神的诞生。诸子之学最大的特点是摆脱了原始巫术传统,重在以人、社会为中心建构学说体系,无论是儒家“修、齐、治、平”的人格理想,还是墨家“兼爱”“非攻”的大爱精神,法家“法、术、势”的政治理想,名家“合同异”“离坚白”凸显出的对事物本质的认识,阴阳家用阴阳五行学说对宇宙模式的解释,或者是道家提倡的“无为而治”的自然主义价值观,其基本价值取向,都是对人和社出路的思考与探索。第二,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追求。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奋斗精神,道家“自然无为”的超现实追求,墨家身体力行、“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而为之”的舍己救世情怀,法家“非古师今”的变法志向,都反映出文化先贤们厚重的社会良知和高尚的理想境界。

周代子学以其丰富的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①产生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如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管子、孙子、惠施、公孙龙、荀子、韩非子等,其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②产生了一批经典性的哲学著作,如《周易》《老子》《庄子》《墨经》《公孙龙子》等。③广泛探讨了众多哲学问题,如宇宙本原和自然规律问题、天人关系问题、阴阳五行问题、人的价值问题、人性善性恶问题、认识论和逻辑学问题等,把哲学研究伸展到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内容极为丰富,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作了坚实的铺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冯友兰先生曾说:“在中国哲学史各时期中,哲学家派别之众,其所讨论问题之多,范围之广,及其研究兴趣之浓厚,气象之蓬勃,皆以子学时代为第一。”(《中国哲学史》)先秦子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诸家各有优劣短长,“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易传·系辞下》)这应该是对周代子学的中肯评价。

第三个阶段:汉唐三教哲学阶段。汉唐三教哲学阶段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阶段。秦

灭六国统一中国,不仅是政权利的统一,也是思想文化的统一。秦历经二世而亡。汉承秦制,延续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汉唐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是从秦代的一断于法到汉代的独尊儒术、从魏晋南北朝的儒、玄、道、佛争胜至隋唐五代的儒、释、道三教并立。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哲学现象是不同学派、宗教的相互论辩与融合。

汉代儒学的显著特点是经学化特征。对暴秦的反思使汉代统治者明白,“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得天下与治天下所采用的政治手段是不一样的。得天下需要武力,而治天下则需要教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先秦儒家为代表的诸子学说的训释与现实王权思想进行杂糅的新儒学——经学就应运而生。所谓“经学”,本来指对儒家经典的整理、研究、阐释,董仲舒则将先秦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家学说中的政治理论相结合,构建出一个以天人感应为特色、以王权至尊为目的的哲学体系,其主要内容为:①宇宙理论。宇宙由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人十种成分组成,互为关系,相互依存,人是天的复制品,“天人一体”的人靠教化与修养与天保持一致。②人性学说。认为人性来源于天,天之所为,有所止,天所不及,则须圣王教化,否则,人性就不能尽显。③社会伦理学说。董仲舒以阴阳学说为理论,指出凡事必有主次、秩序,由此提出以等差形式实现君权至尊和国家一统需要的“王道之三纲”。④政治哲学。认为“天生民性有善质”,统治者有责任帮助百姓发展品德,由此提出庆、赏、罚、刑的“四政”方法。汉代经学的主要特征及影响:①在其发展中一步一步走向烦琐和神秘。其注解经文的文字多的超过原文的上万倍,穿凿附会特征明显。②注重人性理论。董仲舒将先秦性善、性恶说进行改造,提出人性“三品”说(先天性善,不教而成的“圣人之性”为上品;先天性恶,教亦不能善的“斗筭之性”为下品;先天有善有恶,教而能善的“中民之性”为中品),对后来人性理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③天人感应和人性三品理论形成的纲常名教观念成为汉代统治秩序的核心理念,也是后世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和统治者治国化民的基本原则,对中国后世国家形态和文化特征的形成影响巨大。④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核心和正宗,不仅承载着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也是中华文明传承和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与途径,其对宇宙、历史、人性所提供的最初的意义和价值之源,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经学形成的求是、尚用的传统,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经学形成的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无疑是积极有为的,但是,纲常名教的日益社会化和现实功能化却使经学理论不可避免地成为现实政治的工具,在人们的置疑与非难中,对其进行补正的玄学便应运而生。

玄学是讨论抽象玄虚道理的学说。由于经学的政治功能化和对自由学术轨迹的偏移,使具有浓厚思辨性的玄学开始流行。玄学的基本点是将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结合起来,用道家思想的自由思辨特征来补正日益僵化的儒家学说。玄学的理论基础是《老子》《庄子》《周易》所谓“三玄”加上《论语》,其中,《老子》的“道”和“无为”,《庄子》的“虚无玄冥”,《周易》的“象数”和“义理”,《论语》的上下尊卑之分,成为其讨论的基本内容,而讨论的焦点,则围绕本末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和名教与自然之辩展开。

所谓本末有无之辩,即是关于宇宙的本原是什么的争论,这是魏晋玄学的核心命题。玄学家何晏、王弼认为宇宙万物以无为本,无是宇宙的根源。“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40章)“有”的世界都由无而来,而“无”是一种不能被确切地规定和体认的存在。“以无为本”的命题,显然源于老子“有生于无”的观点,这个命题把对宇宙的本质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抽象性与思辨性的高峰。与“贵无论”相对的是裴頠的“崇有论”和郭象的“独化论”。裴頠认为,宇宙的本原是“有”,“无”是“有”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能把“无”作为“有”的根本。至无、绝对的无,根本不可能有“生”的功能,故始生者,只能是“自生”。“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崇有论》,见《晋书》卷三十五《裴頠